

对上海社区建设的一点思考

——在“组织与体制：上海社区发展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

费孝通

研究城市社区建设是我近几年给自己定的一个工作内容。我从研究乡土社会开始,到研究小城镇,现在进入了大城市、大都市,伴随中国社会走过了一条城市化道路。我认为,如果把传统中国社会看作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村一端,那么,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完成整个城市化过程。这个未完成不单单指人口向城市的集中过程或者工业化的过程,还指人本身的变化过程——从农民到市民的变化过程。即使像上海这样已经形成多年的大城市,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也面临着本市和外来农民的市民化以及他们和原有市民的现代化问题。今天的社区建设可以看作是一个城市化过程的继续,既是城市发展的继续,也是市民现代化的继续。我们需要在都市形成和演化这个过程中所生成的文化和社会遗产的背景下,探讨今天对社区建设的研究和理解。

—

现在的上海社区是有其历史文化基础的,我们在研究当前现实问题的时候,不能完全离开它的历史。上海以一个沿海渔村为起点,发展成为今天的国际化大都市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根据史料,上海这个地方从南宋时期开始成为商埠,清初(17世纪)设立过海关,但现代意义上的上海是从1842年“五口通商”开始的,是不平等条约产生的结果。100多年来,上海这个地方逐渐形成繁荣的现代都市社会,从一个小镇到今天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人口其实都是从外面迁移进来的,这个趋势一直没有中断过,而且速度越来越快。

从近代历史上看,上海的城市发展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租界时期,那是老上海;第二个时期是解放后计划经济时代,国有企业是上海市城市建设的重点,从各地招进很多人;第三个时期是改革开放之后,出现了现在新型的上海。

租界时代的上海是一个特殊的时期,上海人的基本居住格局、生活习惯、地方文化都与这一时期有一定的联系。当时的上海已经有了现代社会所有的社会活动和服务设施,人们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也深受现代西方工业化和市场化社会的影响,有很强的市民社会风气。上海不同于其他城市的特点,不仅仅是有更多的洋楼,说更多的英语(洋泾浜),而是心理上和观念上与众不同。上海的文化,所谓“海派”文化,就是上海历史的反映。解放前的上海不仅是近代中国经济、金融的中心,也是新文化的重地,上海人不是只关心经济发展,也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上海的特殊历史地位,也使上海人对于“国家”、“民族”、“国际”、“西方”这些概念有自己独特的感受。对内,上海实际上一直影响着中国其他地区的发展;对外,上海又成为向世界展示中国的窗口。从这个意义上说,上海又是沟通中国和世界的桥梁。

然而,殖民地、半殖民地时期的城市发展,必然有其畸形的一面,在当时上海城市内部,存在着贫富差距,不同社会阶层在居住、生活、工作、劳动方面都体现出很大的不同,这也影响了上海城市基本的居住格局。很多现有的城市生活习惯,都是那些历史时期特殊的条件造就的。

当年上海开埠,海内外四方移民带着原有文化汇集到这个小城镇,海滩上迅速崛起了一个东方国际都市。第一批乡土农民在与占支配地位的、成熟的西方商业文化正面遭遇中被迅速改变了,由此形成的上海市民和市民文化的基因,一直存在于上海人的行为方式,包括社区行为方式之中。具有不同文化习俗的移民及其后裔在共同相处中逐渐演化出共同的规则,形成了较为明确的遵守规则、服从权威的意识;乡土的血缘和地缘关系因为市场和工业经济的影响而被弱化和改造了,但在大都市的生活环境中,家庭内和邻里间仍保留着守望相助的传统;由于长期处于多元并存的文化格局中,市民对差异的包容性,对新事物的开放心态和面对机会的选择能力得到加强。作为这些作用的共同结果,在上海,市民对个人自主性和独立性的需要,对人际关系合理性、选择性乃至实用性的要求都得到强化。具有明显不同的地域文化背景和个性的居民,在一个弄堂甚至一栋石库门中和谐相处,这是那个时期形成的市民文化的重要特点之一,它已深埋于个人的人格结构之中,今天的市民现代化是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发展起来的。

上海历史的第二个时期就是解放以后,上海在计划经济时期是中国最大、最重要的经济中心城市,也是计划经济搞得最彻底、最严谨、最完善的地区之一。历史不能割断,就是在计划经济时期,上海人的工作方式和日常生活方式也体现出原有的传统,体现出上海“市民社会”文化发达的特点。计划经济时代,上海也融汇了各方人才,有许多外地人调入上海,同时还有很多上海人到中国各地工作,包括大量知青到各地下乡,和当地文化融合,后来又把这些文化带回上海。

计划经济时代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单位制”的影响,这几十年里上海都是以工作单位作为城市基本单元组织起来的,在城市居民生活方面,单位常常是主导的因素,很多居住区是属于某一个单位的,居民都是同一个单位的同事,个人自主空间不大,因为计划经济不仅是对物质产品的计划生产,也是对人和人的生活的计划安排。

计划经济下单位制和居住方式之间是有某种协调性的。国营单位中强烈的“公有”气氛,与居民邻里之间“共享”的气氛相辅相成,人们在观念上也倾向于“共有”的感觉。这种“共享”、“共有”的感觉,实际上是和社会学所说的“社区(community)”的意思很接近的。社区,它的含义中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这个“com”,它和“commune”、“communion”有共同的词根,就是“共同的”、“一起的”、“共享的”,就是一群人有共同的感受,有共同关心的事情,也常常有共同的命运。社区中的住户彼此都很了解,有什么事务,大家都有一种责任感,要一起去解决,而不是那种“各扫自家门前雪”的分离状态,这种意识在上海人的生活中,特别是在邻里关系中,是早就有的。在计划经济下,有时候还得到了强化,很多地方的居住条件,也客观上要求这种意识——几个家庭住在一个弄堂中,朝夕相处,不像那种独门独院的居住条件。这些历史,都是我们后来从事社区建设的一个客观基础。

现在上海的发展,可以说正在经历着第三个阶段,就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阶段,这是上海历史上又一个大发展的时代,上海正在建成为国际大都会,并且沿着这个方向继续发展。看看这些年上海的发展就会发现,上海社会和“上海人”都发生了很多新的变化,总的趋势是越来越多样化。上海人自身的创造性已经发挥出来,同时又有很多内地其他地区的人、港澳台同胞、海外归来的人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人,都纷纷来到上海,加入到上海的社会生活中,也带来

很多新的东西,上海的社会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人们的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很多变化。上海的发展,是一个计划经济下的“大城市”向市场经济下国际化、现代化“大都会”的转变。它对上海市民和市民生活的影响特别大,也需要我们好好研究。

在这种大背景下,我们就要考虑如何使城市基层的社区建设跟上上海总体的发展,而且要对上海的总体发展起到保障和支持的作用。上海是一个流动性很强的城市,现在要研究的社区建设,实际上是把上海这样一个正在迅猛发展的国际大都市中的各种各样的人组合起来,组成一个个邻里合作的新社区,建成新的安居乐业的社会,建立起一个地方基层自我管理的基础。这是一个长期的工作,无论如何不能脱离以前的历史和文化。我们要认识到事物的连续性,要研究历史和现状,根据人们的实际需要,提出好的建设方向,确定未来的目标。比如说,上海的历史和现状一直有个特点,就是“多元共处,和而不同”,在普通居民中也有同样的情形。大家居住在一起,息息相关,但人们的爱好、习惯、职业、性格有很多不同,社会阶层也常常相去很远。这种传统会产生一些特殊的要求,这是值得我们今天研究的问题。如何在社区建设中,既培养共同的社区意识,担负共同的责任,又能使人们按照自己习惯的方式,保持自己的活动空间,保持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保持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的多样性、创造性和活力,使得在这里生活的人感到舒适、安全、便捷、宽容而又丰富,这是上海在国际竞争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

面对上海的历史和现状,我们的研究工作要用科学的方法去了解它们的发展过程,了解它们产生的新问题,这正是社会学当前重要的工作内容。比如,要建设新社区,就要先了解原有的基础,原有的社会组织、人际关系,要分出各种性质的组织,各种层次的关系。要首先看家庭,以家庭为主体,由户籍作基础,研究家庭之间的关系。就居住情况看,就可以研究一下在租界时代形成的以“弄堂”为单位的居住格局现在还有多少?在第二个时期体现单位制形式的以集体分配的宿舍为单位的居住格局现在还有多少?居住方式有什么变化?目前的现状如何?现在出现了新建的大楼,新情况出来了,有了物业管理的小区,局面有了改变,改变到什么程度?产生了哪些新问题?

我们知道,市场经济建构起来后,产品和人都无法按照一定的模式去安排了,人在市场上活动,需要自己选择,没有人能够代劳。要选择,就要求自主能力,有了这种能力,就不需要也难以接受被动的安排。人在市场上形成的自主性,必然会带到生活的各个层面。

近几年我们还看到,随着人的流动,个人从市场获得的资源份额有了差别,不同收入人群的出现,表明社会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社会阶层逐步形成。这一点在社区层面就表现为不同人群向不同地域的集中,由经济上自立的人员所组成的同质居民区已经出现,其数量和规模在急剧增长,而需要外部帮助的弱势群体也呈现同样的集中趋势。不同的人群在内部必然形成不同的关系样式和组织结构,在外部必然要求不同的管理模式和服务方式。越来越多的市民经济上自立已经没有问题,他们生活上的自理能力也将逐步形成和提高,随着业主委员会等组织的走向成熟,社区公共事务的自治开始成为居民的内在要求。新型的居民群体,新的生活习惯以及市民与政府之间新的关系样式已经出现。它要求我们尽快找到新的社区管理模式和手段,以跟上城市的变化和发展。社区建设,特别是以群众自治为核心的基层民主建设是一个基本方向。

城市社区被大家看作基层民主建设的舞台和基地,我也一直关注我们国家“草根民主”的进展。农村的村民自治已开展多年,现在城市社区中民主建设也已开始,这是一件好事。但我常常在想,城市社区民主建设或者说居民自治的进程,不仅仅取决于我们的意愿,还有个条件问题,不是说想有就会有的,现代都市中,最底层的民主究竟是怎么出来,需要哪些外在条件和内在条件?这些都要求我们做出理论分析。

从上海目前的情况看,人在社区中基本上还是通过行政体系组织起来的。上海的地区行政系统,在全国范围一直算是比较齐全完整的,即使在单位主导的时候也如此。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市先是为适应经济改革和城市管理的需要,将原先的“两级政府,一级管理”转变为“两级政府,两级管理”,开始行政管理体制向下伸展的过程。新体制取得成效后,1995年上海又进一步提出“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行政构架,街道由最初在单位—行政体制中的辅助地位上升到对地区范围公共事务实施全面管理的地位。街道地位的变化,意味着个人现在主要作为居民被紧密组织到了区域行政体系之中,而不是作为从业人员被单位所组织。1995年上海市在确立“两级政府,三级管理”体制时,结合吸纳下岗国企干部,首次把居委会中的主要岗位列为事业编制,这反映出行政因素向基层生活的渗透。随着个人生活事务不断脱离单位转移到居住区,居委会在社会事务管理上的重要性不断上升,到世纪之交,上海市“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的城市行政构架最终成型。

纯粹从行政体系自身运作及其有效性来看,四级网络的构想有其合理性。单位行政职能弱化后,政府在完成职能转变之前,需要有基层组织承接城市管理事务。但作为行政架构的基层部分,居委会在推进居民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监督时,难免会遇到某些困难。由居民选举产生的居委会,仍需执行街道和职能部门乃至各方单位的指令,这意味着居委会虽然体现和扩大了行政体系与基层社会的接触面,但就其性质而论,尚未成为基层社会自身的组织形态。要促进居民的自我管理,还需要找到与之相适应的组织形式,这样的形式不只是一种,可以有多种。

居民作为完整意义上的市民来参与社区管理,其内在条件是否已经具备?不用行政方式,作为个人的居民如何走到一起来?他们是否认同行政意义上的社区这种组织形式?是否认为社区事务是与自己有关的公共事务?这些问题仍有待回答。社区不可能像单位或家庭一样,因为没有那么直接的经济利益和血缘之类的纽带。在社区里,个人凭什么接受管理或制约,又为什么要“管闲事”?上海人是很喜欢讲“关你什么事”和“关我什么事”的。要让大家接受管,愿意管,主要还靠文化认同,在价值观、思想方法和生活方式上找到同一的感觉,共同管起来。上海人以前对不同居住区域有“上只角”和“下只角”之分,从形式上看,就体现了以生活方式为对象的文化认同。经过这么大的变迁,传统的“上只角”或“下只角”区域有些模糊不清了,但观念还在,心理基础还在,作为思路,我们今天在寻找社区认同基础时,还可以借鉴。可以把这个文化的基础再拓宽一点,内涵挖深一点,与居民的生活联系搞得更全面一点,作为生活方式的特点再鲜明一点,这样形成的社区认同,作用可以更大一点。

要落实居民自我管理,需要有相应的管理人和管理社区的方法与手段。已经达到经济自立的居民在基本生活方面不需要依靠别人,计划经济体制下常用的权力形式也失去了用武之地。彼此平等的居民之间需要一种“同意权力”。它不具有强制性,但有约束力,约束力不是来自于外部压力,而是来自于因为自愿参与和自主选择所形成的内在动力。社区建设强调参与,视之为社区中人的管理和社会管理的主要方法,道理就在这里。“同意权力”主要是从决策参

与中产生的,因为只有主动的同意才是真正的同意。建立在这样的同意基础上的权力,才能得到广泛的认可和服从。所以,基层政府在积极动员居民参与的基础上,要及时而充分地授权给居民,增加他们参与决策的机会,尽可能把社区层面与居民直接有关的公共事务交给居民自己来决定,逐步使居民从认可具体事务上的自我决定,进到认可自我决定的方式,进到认可做出自我决定的权力,最后形成认可和尊重自我决定的习惯和制度。有了这个基础,“草根民主”、群众自我管理就可以比较顺利地建立起来。

三

我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根据群众的需要来开拓我们的社区建设事业,要看到这种家家户户共同参与社区事务,但各家各户又有不同兴趣、不同要求的发展趋势,探讨如何根据这种情况采取不同的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来满足群众的要求。

社区组织的出现,是居民实际生活的需要。社区建设也不是抽象的名词,它体现了一批人所发生的地缘关系和互助合作关系,包含着许多服务性内容。旧上海有各种组织来做服务性工作,解放后是行政机构代办,现在发展的趋势是居民自理,研究这个过程很重要,它直接涉及到社区的基本功能,关系到如何提高城市建设“人文关怀”的水平。

要想使社区建设贴近人们的实际需要,有些事务就要由居民们自己商量决定,居民自己清楚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在这个基础上,不同居民的愿望和要求如果有差别,就可以进行协商和协调,这就自然导出了各种合作,找到合情合理的优化方案,这种大家互相协调的过程,是社区的一个“功能”。这种根据大家的需要,提出建设性建议,互相协商,找到实施办法的做法,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自理”。我们需要看到这些变化的过程,了解这些共同生活的人们如何出人出力自己来解决问题,如何从过去的依靠别人代理,到现在自己要求建立一个委员会、一个组织,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这种自理的要求是构成社区组织的新的因素。

如果我们能针对目前的实际情况,逐步引导人们在社区层次上一步步走向自理,扩大民主生活的基础和范围,就会从最基本的层次上促进一种具有人文精神的、优化合理的社会生活,使我们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的目标实实在在地上一个台阶,也为中国城市建设建立一个重要的示范。

上海社区建设离不开上海的现代化、国际化这个大背景。我们要把眼光放开,要看到国际化过程中未来的发展趋势。今天的社区建设是面向未来的,既要考虑到上海作为中国的重要经济金融中心的地位和要求,也要考虑上海作为亚太地区主要中心城市和世界重要都市的前景。在现代化、国际化的社会条件下,人和人的关系会有一些新的特点,生活方式会有很多不同,社会机构也会有很多调整,家庭、邻里、同事等等关系都在变化,这是一个动态的东西,怎么变,需要我们去研究。在“信息时代”——也有人叫“数字化时代”——家家户户都可以通过电脑“上网”,网上还有“虚拟社区”。在这样的时代,社区的意义是什么?社区建设的意义是什么?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态度有什么不同?个人、家庭的日常生活需要什么变化?个人和组织、个人和社会的关系有什么变化?这都是我们必须研究的问题,特别是像上海这种走在现代化最前沿的城市,这些新的东西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它们已经不是“未来”,而是正在逐步变为“现在”了,是现在每天正在发生作用的东西,社会生活中有许多新的东西都是从这里面出来的,这些新东西就是影响我们社会未来的东西,我们的研究要把这些都包括进去,都考

虑进去,把我们的社区研究建立在既脚踏实地,又高瞻远瞩的基础上,真正造福于身处现代化和社会变迁过程中的广大市民。

社区建设硬件是必要的,但软件更重要。要使社区真正成为一个守望相助的共同体,还得依靠居民的共识。共识来自于共同的需要和活动,我们要面向有着不同需求的居民,找到大家共同的生活内容和共同的活动方式,为居民的共识建立一个现实的基础,也需要创造条件,帮助居民形成集体生活的行为习惯和道德意识。如何结合居民的开展道德建设,帮助他们提高自己的素质,培养自己在社区中自主安排共同事务的观念、能力和习惯,仍是社区建设和社区研究的一个重要而紧迫的课题。社区建设的目的之一是要建设一个基于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之上的守望相助、尊老护幼、知礼立德的现代文明社会,这实际上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一部分。坚持党的领导是“草根民主”建设的基本保证,我们要研究,在居民经济上已经自理,社会生活上开始初步自理的情况下,如何改进和完善居民区党组织对各类社区组织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式,如何充分发挥社区党员的示范和凝聚作用,如何在尊重居民意愿和要求的同时,促成全社区互相合作、协力安排共同生活的格局,建设起多样化的、充满生机的、以群众自我管理为主的新型社区。这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上海市民现代化的重要一环。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充分认识到这一事业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发挥创造和探索精神,深入生活实际,共同把这项工作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2002年4月12日
责任编辑:张志敏

第36届世界社会学大会准备情况通报(五)

第36届世界社会学大会的准备工作自启动以来进展顺利,到2002年5月28日止,共收到咨询邮件(包括传真、信函、电子邮件等)近500件,其中报名表约60份。

大会荣誉委员会委员名单已经确定,世界著名学者吉登斯、沃勒斯坦、艾森斯塔德、金耀基等已同意担任委员。会议日程也已确定,开幕式将于2003年7月7日上午举行,届时,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北京市人民政府领导将出席大会并致辞。

经与国际社会学机构领导人商议,大会的主题论坛初步确定为:1. 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学研究;2. 变迁中的文化与全球化;3. 全球化与中国社会转型;4. 人口流动、平等与全球化;5. 社会发展与社会政策。

大会网站的更新工作已进入第2阶段,目前有关大会的注册、食宿、旅游等方面的信息已经在网站发布,敬请浏览。

第36届世界社会学大会组委会秘书处